敕勒之歌

——它的原来的语言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日〕小川环树

北齐时代斛律金（488—567年）咏唱的《敕勒歌》，为明清以来的古诗选集所必录，文学评论家认为这篇诗歌有很大的价值。其实，这首诗歌原来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唱咏的，我们现在读到的，只不过是一份汉文译本。关于其原来的语言是什么，看来一直到现在，文学史家们都不太注意。这首被译成汉语的少数民族诗歌，作为一首优秀的诗歌，曾经感动过许多人。这不是希有的事吗？我在探索其原来语言的过程中，意外地又发现了另外的问题。它已经不止于文学史上的事件，而是属于文化史上的现象了。要阐明这个问题，有很多地方我还不能胜任，尽管如此，我还是敢于提出问题，敬请博雅指教。

一、《敕勒歌》的全文

斛律金咏唱《敕勒歌》这一事实，见于正史，然而，却没有记录它的歌词。现在所见的最早的记录，则是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曰：

“《乐府广题》① 曰：‘北齐神武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武王恚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免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乐府诗集》卷八十六）

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卷一中．也曾引用这首诗歌，除了第四句“笼盖四野”作“笼罩四野”外，没有异文。《资治通鉴》卷一五九胡三省注引洪迈之语，也作“笼罩”。

二、诗歌的背景

关于斛律金咏唱《敕勒歌》的背景，《乐府广题》的记载不是充分的，而且，这段记事还有些错误。根据《北史·齐本纪（上）》的记载，神武帝（高欢）进攻西魏玉壁城失败，是在东魏武定四年（546年）。《北齐书》的记载与《资治通鉴》卷一五一九“梁武帝　中大同元年”条几乎相同。

玉壁城相当于现在的山西省稷山县，高欢让唱《敕勒歌》是在撤兵之后，可能是在晋阳吧。唱歌的是高欢部下的将军斛律金，但据说高欢本人也和唱。这首诗歌一定不是当时所做的，而是在高欢部队中经常咏唱为很多人所熟悉的。

洪迈引用了北宋诗人黄庭坚《山谷题跋》中的话。黄氏说，唱歌的是斛律明月，他是个胡儿，他并不以文学称著，然而，在老胡（指高欢）的命令下，仓卒之间，作成这首诗，“语之奇壮如此，盖率意道事实而已”。斛律明月是斛律金的儿子，这可能是黄氏记错了，洪迈已经有所辩证了。

再说，黄山谷以为《敕勒歌》是斛律明月（其实是其父）即兴所作，原本就是汉文，这也是错误的。前面所引的《乐府广题》中，明确地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此书著者沈建所根据的更早的资料，虽然现在我们无法知晓，那也不会是无稽之谈。沈建所说的“齐言”，大概就是中国话（也即“汉语”，下同）这可能与在北朝时翻译的佛经中，凡引梵语，辄称“秦言某某”，即指苻秦（351—394 年）或姚秦（384—417 年）的语言，也即汉语是同样的意思。根据“易为齐言”这一句话，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敕勒歌》的原来语言并不是汉语，而是别的民族的语言。但是，这里说的“鲜卑语”到底是何种语言呢？下面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

三、歌者的民族与语言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咏唱《敕勒歌》的斛律金的出身。据传记说，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其高祖名倍侯利。北魏道武帝时（402年前后）内附，赐“大羽真”之位阶及“盂都公”之称号，世仕于北魏（《北史》卷五四）。史称“金性质直，不识文字”。这很有趣。斛律金可能会说中国话，但没有汉字的知识。他的字叫“阿六敦”，这可能是突厥语的原来的名字②。他的汉名最初是把原名缩小作为“敦”，可是，因为在文件上签署这个“敦”字感到困难，为了容易写些，便改成了“金”字，但他甚至连“金”字也写不了。据说北齐当时的将军司马子如曾教他只要象屋顶那样写“金”，就能写对了。我不相信一个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的人，能够即刻用汉语文言来写作诗歌。

斛律金是敕勒部的人。据《北史》记载，斛律氏是高车族中的一姓（clan）。这一族也叫做“狄历”，或“高车丁零”（《北史》卷九八）。北魏道武帝曾与他们打过仗。倍侯利（斛律金高祖）在与蠕蠕（Avars）的战争中败绩，逃跑到北魏，大概是在 401 年（天兴四年）以后的事。此后，他作为北魏的一个将军而活跃。一般认为，他死在道武帝去世的 409 年以前。

把“敕勒”叫做高车族，这是北方人给与的名字。他们本来的族名是“狄历”（中古音d'ek-liek）-或是“丁零”（中古音 tieng-lieng）而“敕勒”（中古音 t'iək-lək）是其异译。作为“别帅”的名字而记录下来的“敕力犍”的“敕力”（中古音 t'lok-liək）也可能表示了同一种词语。至于在唐代写做“铁勒”（中古音 t'et-lək）的，也可能指这个“敕勒”而言。

Chavanne（沙畹）曾经认为，它们相当于“Tölös”如据羽田亨先生所考证，这些译音的原文应当是“Türk”，即“突厥”（Türküt）。总之，这是属于广义的土耳其族的一种。

如果斛律金确是一个突厥人，那么，他所咏唱的《敕勒歌》当然是一首突厥语的诗歌。果真如此的话，前面的《乐府广题》的记事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沈建所述，“其歌本鲜卑语”，那么，鲜卑语就是突厥语吗？

建立北魏国家的拓拔氏是鲜卑族的一部，尚有若干“部”，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这些民

族的语言，即鲜卑语．曾经被认为是属于蒙古语系统的，但近来认为应属于土耳其语系统的看法也相当有力。假定鲜卑语是蒙古语之一种，蒙古语与突厥语虽然同属阿尔泰语族(Altaic family)，它们是不同的语言。一个人如果只懂一种语言，当他听到另一种语言时，是否会很容易理解呢，这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斛律金他们的敕勒部，早已离开故地，数代居住于今山西省北部，在此其间，他们服属于鲜卑族的政权，可以想象受到鲜卑语的不少影响。不管《乐府广题》所根据的资料是从哪里来的，它肯定是汉人的记录，恐怕没有注意到鲜卑语与敕勒语之间的区别．如果从最近的学说来说，认为鲜卑语近于后来的土耳其语，那么，上面我所述的疑问也就完全冰解了，而《乐府广题》的记事不是不正确的。

总的说来．高欢本人很喜欢《敕勒歌》，所以他命令斛律金咏唱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其意义在当时是十分明白的，所以被北齐宫廷中的某人译成了汉文诗歌。

四、突厥语民歌的形式

《敕勒歌》的原文是不是突厥语，看来好象是没有意义的探讨。但我之所以要略微固执地坚持讨论这一问题，其理由是因为这首诗的形式，通过汉语译文来看，它与突厥民歌的形式非常相似。我在这里说的“突厥民歌”，指的是在 1073 年 Mahmūd ibn alHusain alkāsgari 所写的《土耳其——阿拉伯辞典》(Diwān lugāt at-Turk)中所引用的材料。这部辞典(以下称为 Diwān)称引了很多突厥语民歌的断片。我不懂得突厥语 (Diwān 除了民歌原文以外，还有阿拉伯译文)但据 Brockelmann 的研究③，看到原文和德译，很感兴趣。

Brockelmann 所引用的很多的诗文，都是断片的二行诗 (Doppelverse)，把这些断片集合在一起，则可以恢复若干篇诗歌的原貌。Brockelmann 所提示的就是这样一个辑佚本。断片的每一节的末尾都有韵脚，以诗歌的内容和韵脚为线索．便可以看出，这些“节”．本来是构成某几篇长诗的一部分：从诗的内容来看，也能知道有些是挽歌，有些是英雄叙事诗，还有些是情歌等等。

就形式而言，各个断片是二行诗．但其实是一首四行诗(按照中国习惯，就是四句)，每一行的音节数都基本上相同．在每一行中间的一定位置上有“休止”(Caesura)，各行末尾押韵脚。常常是第一、二、三的三行用同一韵脚，而第四行用另外的韵脚。有很多断片的第四行的韵脚．又往往和其他一个断片的韵脚相同。B 氏辑本便是以这些材料编成的。辞典(Diwan)编集于十一世纪，所引用的民歌恐怕要更早一些，而且看不出十世纪末以来的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其内容和形式，都是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突厥人还没有受到阿拉伯和波斯的影响以前的东西。这就是 Brockelmann 的说明的概要。

关于形式，能够引起我们的注目的是，有很多断片的一行有七个音节，每一行的第四音节之后有休止。这里，我以 Brockelmann 所辑录的第七类“自然描写”之中的一节为例来说明：

AlIn tübü yeserdi,
(山岭和丘陵都已成绿)
urut otin yaşurdi;
(嫩叶遍布)
kölniиğ Suwin köşerdi,

(让海水泛滥)

Sigir buka munğraşur.

(牡牛和牝牛互相叫吼)

此外，还有以八个音节成为一行的四行诗，和以五个音节的三行及有七个音节的一行所构成的；有以十四(或十三)个音节和十五个音节构成的二行诗；有以六个音节的二行和有七个音节的二行构成的四行诗，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最多的还是在此举出的以七个音节为一行的四行诗④，押韵的方式(aaab)也以这种方式为其代表。

五 《敕勒歌》与突厥民歌的相似性

拿我们在第四节中所介绍的突厥民歌，与《敕勒歌》相比较，便可以看到明显的相似。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仄韵 ○平韵)

这是汉译，但各句的音节数是三·三(韵)四·四(韵)三(韵)三(韵)七(韵)。如果按着这种韵法来整理一下的话，那么，前半部的四句，是可以做为六个音节(三休止三)和八个音节(四休止四)的两行，照此，后半部的三句，则也是六个音节(三韵三)和七个音节的两行。此诗汉译是七句，但其原文与Diwān所引用的断片一样，不也是四行诗吗？汉译大概是尽量符合原歌的音节来选择译语的。我认为，译诗与原作合用同一旋律，可以歌唱。这样，我们算得到了六世纪突厥民歌的忠实的汉译。虽然移译其内容如何严密无从知悉，但它很忠实地遵守原歌的韵律——如果仅从音节的数目来看，近于"六·八·六·七"形式的诗歌，实际上就是在 Diwān 所引用的断片中，也可以见到的⑤。

六 所谓北歌与唐代歌曲

只看Diwān 所引用的资料，最先在我的头脑里浮想起来的，便是中国的七绝。七绝是四行诗，每一行有七个音节。这两个特点与前述民歌是共同的。那么，突厥民歌的形式是否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呢，要肯定这个事实是很容易的。从七世纪初叶到九世纪末期，繁荣的唐帝国的文明，很可能使邻近的突厥民族受到影响。但我想，我们也应该考虑到相反方向的影响。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Diwān 虽然并不包括十世纪以前的古老传说，但《敕勒歌》是从很早以前，即在六世纪初叶就已经被传唱了，在当时的中国，七绝这种形式，也只是刚刚开始萌芽。

不仅如此，从整个中国音乐文学的历史来看，有一种很明显的现象，我们必须注意到，外来的音乐和歌曲，常常促进中国的韵文产生新的形式。从东晋、南北朝一直到唐代(四——十一世纪)，不，可能从更早的时期以来，西北民族的歌曲络绎不断地流入中国，在中国的诗歌文学中留下了它们的痕迹。其中，我现在只提出一个与当前的问题有关的事实。

从北魏、北周到隋朝，有一种被称为"北歌"的歌曲，常和西凉的音乐一起合奏，至唐代还存有五十三章，从其中多有"可汗"这个称呼的词来看，恐怕是鲜卑的歌曲吧。唐开元初年

(八世纪)的歌师长孙元忠说，贞观年间，他的祖父随将军侯贵昌学北歌。贵昌是并州人，可能是鲜卑人。歌辞的意思，连朝廷的翻译官也听不懂(见《旧唐书·音乐志》)。这大概是照鲜卑语的原文唱的，可能还有讹音，因而难于了解。在这个记载中，提到北魏的"簸罗回"之歌。我想，这"簸罗回"与"回波乐"(见于《魏书·尔朱荣传》和《唐书·李景伯传》)是同一的。"回波乐"的歌辞是六言四句(见《乐府诗集》卷八十)⑥。

抑有进者，唐代乐府体的诗绝大多数不是可唱的，只有七绝和五绝是可以唱的。《集异记》所载盛唐诗人的逸事是众所周知的。王维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即《送元二使安西》那首诗，后来叫做阳关三叠之曲，在中唐时送别宴席上是常常被咏唱的，因而脍炙人口。至于歌曲所唱之辞，以用七言四句的诗为多，因为这些歌曲的旋律和节奏恰好适合于七个音节一句的诗这无可怀疑。在唐代乐府体作品里，有不少的曲名含有西北的地名，比如"凉州歌"，其中有很多歌辞是七绝。这使我们想见当时西凉音乐的盛行。西凉乐曲并不一定是突厥语的歌，但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中亚与北亚各少数民族的诗歌形式的影响。

我已经说过，七绝比五绝发生得晚些。我猜想，七绝的发展大概和北歌的形式有很深的联系：不但如此，六绝的发生和北歌有更密切的关系，除了"回波乐"以外，还有几个以六言四句作为歌辞的曲，其中之一便是北齐时所作⑦。这些现象，可以认为是互相连贯的。

北歌的原文已经消失了，《敕勒歌》是直到今天还保存着原歌韵律的唯一的汉译本。我认为，通过这一译词进行研究，或可更深地认识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这是我所切望，尚请诸位指教。

附记：今年春间，我访问北京大学，讲述大概，承严绍璗君与中岛碧女士两位译成中文，厚意可感，我不过略加修补。1981年5月23日，小川环树识于京都。

译者附记：小川环树先生是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京都产业大学国际语言研究所所长，1933—1936年曾就读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是他去年应邀访问我国时在母校所作的学术报告。

注① 《乐府广题》二卷，沈建撰(《宋史·艺文志》)。1957年上海印，18页。

② 阿六敦当是维尔吾语"altun"(黄金)的译音。他的汉名"金"即为意译了。又据Boodderg，他的姓"斛律"，也是突厥语"oγul"(儿子)的译音(参照P.A. Boodderg《Two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Frontier》Harvard Tournal of Asitic Studies, vol 1, p. 306 note 80)。

③ Carl Brockelmann, Altturkestanische Volkspoesie. Asia Major 1923—1924.

④ Brockelmann氏所辑录的断片诗，共计二百二十九节，其中以七音节为一行的四行诗，约有一百五十个左右

⑤ Brockelmann氏所引有一节二行诗，是可分析为四·四·六的一行和四·四·五的一行。各行音节的总数与《敕勒歌》(假如把反首三句认为一行，右三句认为一行的话)恰恰一致。其余也有6+6+7+7，7+6+7+6，和6+6+6+7这些形式，并且每行六音节构成的四行诗也很不少。

⑥ 新旧唐书皆以《簸逻回》为北歌之一(《通典》卷一四六作"逻回"，无"簸"字，当是脱文)。《簸逻回》(中古音puâ-lâ-γuâi)和《回波乐》(γuâi-puâ-lâk)可能是同出一源，是一词转化的。《通鉴》卷一五二"大通二年条"胡注："乐，音洛")

⑦ 例如《三台》(《乐府诗集》卷七五)、《破阵乐》(卷八〇)。《三台》又题云《突厥三台》，显然是出于突厥语的歌曲，而且据说是北齐文宣帝时所作。